
贵州建省六百年之“黔中三宝”^{*}

王路平¹

(贵州省社会科学院文化研究所, 贵州 贵阳 550002)

摘要: 贵州建省 600 年来, 贵州传统学术文化瑰宝中最具有本土特点且又最能与全国乃至世界学术文化接轨、交流和对话的当首推“黔中三宝”, 即黔中王学、佛学和易学, 这“三宝”是黔中传统文化中的奇葩, 它们相对于贵州原有的其他地域文化来说, 具有更加系统、更加理性和更加深刻的特点, 再加上这一传统文化本身所蕴含的深厚的中国文化精神, 使其自然拥有宏大的文化影响力和亲和力, 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至今仍然能够给予人们以形上智慧的启迪, 值得我们重新发掘和认识。

关键词: 贵州建省; 600 年; 王学; 佛学; 易学

中图分类号: G12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 — 5099(2014) 02 — 0044 — 05

《周易》说:“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这意思是说关于宇宙人生的本质和规律是无形而根本的,这就叫做“道”,而万事万物是有形而具体的,这就叫做“器”。我们把依据形而上之道得出的思想称之为形上智慧,因为它作为精神性的价值信仰系统,能够为人们提供一种安身立命的一贯之道。那么,从形而上的“道”来观照贵州文化及其文化大师,贵州能带给人们什么东西呢?从历史来看,贵州虽僻处西南边陲之地,然山明水秀,人杰地灵,汉代即有舍人、盛览、尹珍,开创黔中学术气象。唐宋以降,兵燹屡兴,天荒人废,虽代不乏人,而载籍难考。至明永乐年间,始置贵州布政使司,由是人文彪蔚,与中原学术文化交流渐多,至明中叶后,黔地学人始称盛焉。建省 600 年来,在贵州的传统学术文化瑰宝中,最具有本土特点且又最能与全国乃至世界学术文化接轨、交流和对话的当首推“黔中三宝”,即黔中王学、佛学和易学,这“三宝”是黔中传统文化中的奇葩,它们相对于贵州原有的其他地域文化来说,具有更加系统、更加理性和更加深刻的特点,再加上这一传统文化本身所蕴含的深厚的中国文化精神,使其自然拥有宏大的文化影响力和亲和力,具有强大的生命力,至今仍然能够给予人们以形上智慧的启迪,值得我们重新发掘和认识。

一、黔中王学: 1500 年所积累的形上智慧

黔中王学的产生缘自明代著名哲学家王阳明。明正德元年(1506),王阳明在北京任兵部主事时,因上疏营救南京科道员戴铣等,被宦官刘瑾陷害,廷杖四十下狱,同年十二月谪为贵州龙场驿丞。正德三年(1508)三月到达贵州,五年(1510)初离开贵州,谪居贵州有三个年头。其间他于龙场悟道,使举世闻名的心学诞生于贵州。又创办龙冈书院,主讲贵阳文明书院,首开黔中书院讲学之风,培育了大批黔中“夷汉”弟子。

王阳明在贵州讲学时,曾出现如嘉靖《贵州通志》所载“士类感慕者,云集听讲,居民环聚而观如堵”的盛况。在数百听

¹收稿日期: 2013 — 12 — 18

基金项目: 贵州省社会科学院基础理论研究重点项目“贵州佛教文化研究”。

作者简介: 王路平(1956 —),男,湖南湘潭人,贵州省社会科学院文化研究所研究员,贵州省易学与国学研究中心主任、贵州省省管专家、贵州大学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 地方文化。

讲者中，其著名者有席书、刘秉鉴、蒋信、冀元亨、陈宗鲁、汤伯元、叶子苍、钱凤翔等人，他们是最早在贵州传播王学的学者。

王阳明离黔后，王门弟子在黔中南北分化，继续弘扬师说，大振阳明心学，讲学之风，盛极一时，使阳明心学遍播全省，贵州人文蔚成大观。继王阳明于龙场创办龙冈书院后，其弟子和再传弟子中也有许多人在贵州少数民族地区建书院、讲心学。王阳明谪黔成就了黔中人文的大事因缘，为贵州培养了一大批心学弟子，再通过其亲传弟子、再传弟子、三传弟子、四传弟子等的大力宏传、发展，至晚明时期遂形成贵州阳明文化圈。贵州阳明文化圈中的历史文化资源，不仅是王阳明“龙场悟道”、“贵阳讲学”、“游历黔中”的真实见证，而且也是蕴含着贵州明代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和习俗等诸多方面的信息载体，具有博大精深的文化内涵和独特的不可再生性的历史价值，因而它们将对当今的学人和游客产生越来越大的吸引力和感召力。在中国，王学的核心区域有五处，即浙江绍兴地区、贵州贵阳地区、江西吉安地区、江苏泰州地区和广东潮州地区。绍兴地区是王学的发祥地和阳明学说的成熟地，贵阳地区是王学的奠基地和过化地，吉安地区是王学的发展地和极盛地，泰州地区是王学的创新地和变异地，潮州地区则是王学的跨文化互动的融合处。

黔中王门，不仅可单独立门户，还可以作为王学向文化边缘地区传播的成功范例。在王阳明及其黔中王门弟子的影响下，终明之世，贵州各地建有书院 20 余所，书院讲学之风盛于中原，俊杰之士，比于中州。贵州是王学的诞生地，王阳明悟道的龙场（今贵州修文）又被历代学者视为“王学圣地”，故而无论是古之王门各派，还是今之新儒学，无不以黔中王学为其渊藪。大学者黄宗羲于清康熙十五年（1676）著《明儒学案》时，按照地理人文将阳明后学分为浙中（浙江）、江右（江西）、南中（江苏）、楚中（湖南、湖北）、北方（河南、山东等中原地区）、粤闽（广东、福建）和泰州七大体系。却漏载最早传播王学、开拓一方文明、颇具一定规模和造就了著名学者的黔中王门，致使黔中王门后学长期鲜为人知，被冷落忽略达数百年之久。今天经过贵州学者多方奔走呼号，大力宣传论证，“黔中王门”之说已被世人普遍接受。“黔中王门”具有以下特点：第一，贵州是阳明心学形成的原点，在时间上，“黔中王门”最早学习和传播阳明心学。第二，“黔中王门”有众多著名学者，颇具一定规模，且影响一方。黔中王门的代表人物有贵阳的马廷锡，清平的孙应鳌、蒋见岳，都匀的陈尚象、余显凤、吴铤，思南的李渭、冉宗孔、胡学礼等人，可谓人才辈出，群星灿烂，其中以孙应鳌、马廷锡、李渭三人为之最。其中之孙应鳌崛起于西南，乃为一代名臣大儒，为黔中王门儒宗。他孜孜不倦，以培育人才、兴起儒学为己任；当晚明心学风靡之际，传阳明心学于贵溪徐樾，与阳明后学诸子纵横交往驰骋，朝野内外莫不推服；又在黔中故里黔东南清平（今凯里市炉山镇）建平旦草堂、学孔书院和山甫书院，集一生学问，阐明儒家文化和阳明心学，一时著书讲学，蔚成风尚，流风余韵，沾溉黔中数百年。第三，它具有贵州本土色彩，在思想上颇有共同的特点：一曰不执门户之见，颇具海纳百川之风。这点尤以孙应鳌最为突出，从而形成了自己的心学理论体系；二曰以求仁为宗，直揭知行本体。王阳明在贵阳始论“知行合一”说，使黔中王门弟子深受教诲和启发，从而将仁德作为知行本体，着力躬行实践。如李渭之学就是以求仁为宗，以毋意为功，力倡先行，而孙应鳌之学则主张即仁是心，知行合一，经世致用，恰可与李渭相互印证；三曰以经证心，勇于创新。例如，孙应鳌在解读四书五经时，往往是“以经证心，以心证悟”，不拘于传统的训律，不死抠书本，常常是随己发挥，从心学的角度去解释诸经的内容。这在当时有发挥人的主体意识、摆脱经书的束缚、启迪人们积极思维的进步作用。第四，它影响时间长，分布地域广。黔中王门主要有四代弟子，从明代中期一直持续到明末，影响长盛不衰。当时，它以贵阳、清平、都匀、思南等地为王学重镇，围绕所创办的书院开展心学的交流和传播活动。在贵阳有马廷锡执教的“阳明书院”，在清平有孙应鳌创办的“学孔书院”，在都匀有陈尚象、余显凤等人兴建的“南皋书院”，在思南有李渭讲学的“中和书院”等等。由此成就了晚明阳明文化的历史辉煌。由此可见，贵州阳明文化圈是中原主流文化与贵州民族文化相交汇融合而产生的富有本土特色的文化现象，具有极高的文化品位，不仅本土色彩鲜明、民族特色浓郁、历史积淀深厚，而且独具魅力，价值非凡，意境深远，值得人们去关注、去研究、去开发。

王阳明谪居贵州龙场前，一直在苦苦思索成圣如何可能，以至格竹成病。他深切体察古之圣人的良苦用心，经历了炼狱般的煎熬而于龙场悟道，终于消解了生与死、心与物、有限与无限的内在紧张和二元冲突，实现了从求理于物向心即理的哲学转变，实现了人生脱胎换骨的转变。其后他以无挂碍的生命实践和活泼泼的教化方式，先立其大，明其心体，又由体发用，即体即用，自觉履行成圣成贤的道德使命，担负起社会人生的责任与义务，展现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的博大胸怀。

龙场悟道，还使王阳明把孔孟儒学经过 1500 年所积累的形上智慧在明代中叶发扬光大，以“心即理”“知行合一”“致良知”以及“世上磨练”“万物一体”的理论，构筑了他博大精深的心学体系。500 年来，王学不仅挺立了主体精神，展示了生命的自由，而且冲决了官方程朱理学的思想罗网，使当时的思想界获得了一次大解放。其哲学理念，为成千成万的仁人志士提供了具有终极关怀意义的宇宙观、人生观、价值观，为儒学在生命哲学、伦理哲学和宗教哲学三大领域中开拓了广阔的发展空间，为儒学从中国走向世界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在儒学日益成为 21 世纪东西方文化交流对话语境中的显学之时，王学的人文精神就日益具有坚强的生命力、持久的说服力和深刻的前瞻性。它对于我们开启主体道德意识的自觉性，塑造我们的理想人格有积极意义，对于我们现代人挺立良知的主宰性，彰显人生的价值和意义有振聋发聩的作用，对于当前我们构建生态文明社会具有深刻的启迪意义。因此，开发具有原创性和根源性意义的黔中王学这个宝库，对于现代人来说无疑是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的。

二、黔中佛学：贵州学术思想文化的精华

黔中佛学则是与黔中佛教相始终，主要以明末清初的贵州禅宗为代表。

唐代牛腾在贵州大布佛教，是为佛教传入贵州之始。自此贵州乃有佛寺的兴建、佛像的铸造和僧人的活动。然其时佛教的传播仅限于黔北和黔东两个地区，以中原的大乘佛教为主流，以南诏佛教为支流。进至宋代，在黔北、黔东地区，佛教仍以强劲的势头向纵深发展，佛寺遍布其地；另一方面，随着佛教在贵州各地传布渗透，贵州土官土酋开始热衷奉佛兴寺，如黔东南的向氏、黔东北的田氏、黔北的杨氏、黔中普宁州的孟氏，皆笃信佛教，大建梵刹，由是佛教影响深入少数民族地区，贵州腹地亦始建有佛寺，住有僧人。至元代，佛教随中原文化深入贵州腹地。其时印度指空禅师在黔西弘法，江西人彭如玉于黔中传教，二者异曲同工，注重神通灵异，皆与黔地原始巫风相契，遂使佛教深入黔西苗彝聚居之区和崇山峻岭的黔中腹地，从而大大拓展了佛教在贵州传播的领域。

明代贵州建省后，贵州佛教开始进入繁荣发展时期。首先，密切了与中原佛教的关系。在明王朝倡教政策的支持下，贵州土司流官崇佛兴寺，僧官始持教度僧，黔中僧徒士民大建寺庙，高僧大德亦联袂而起，遂使佛教迅速在贵州传播。其次，通过“调北填南”，特别通过军屯、民屯、商屯，大批汉人移入贵州。这样，一方面将汉族固有的佛教信仰带入贵州；另一方面又为僧人深入黔境游方行化提供了物质基础；再次，明代贵州大修驿道，遍立卫所，形成了一条以府治卫所为通道的佛教传播路线，横贯东西，纵穿南北，使佛寺遍及各府卫。

明末清初，天崩地解，贵州涌现了以丈雪、敏树、燕居，圣符、山晖、莲月、语嵩、赤松、瞿脉、厂石、善权、善一、梅溪等人为代表的一大批灿若群星的佛学大师，他们的语录著作，不仅代表了当时西南佛教思想界的最高水平，而且也反映了贵州地区禅宗鼎盛的实况，仅《嘉兴续藏》就收入黔僧语录达数十种之多。他们的人品学问、弘法业绩和佛学造诣，不仅彪炳黔省，冠映西南，即与中原诸佛学大师相比，亦不逊色。其影响所及，不限于佛教僧徒内部，而与当时的主要社会思潮和哲学思潮亦息息相关，其佛教哲学内涵十分丰富，心理分析相当细致，辩证法思想也非常深刻，从而呈现出强烈的时代特色和地方特色。这些佛学大师不仅给贵州的哲学、思想文化以很大影响，而且还对安定贵州社会，教化黔中人民，培养乡邦人才，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这些贵州佛学大师的禅学著作在全国也有一定的学术地位，不仅撰写中国禅宗史有必要对其进行研究，编纂完整的中国哲学史、中国思想史时也不能忽视其之存在与贡献。从贵州的这些佛学大师的思想中，可以看到禅学是贵州乃至中国学术思想文化的精华，是东方形上智慧的代表。遗憾的是，由于贵州地处西南边陲，境内山峦重叠，自古以来为“西南之奥区”，黔中佛学也因之湮没在人们的偏见和漠视之中。即使在今天，这些黔中佛学大师的思想，亦鲜为人知，这不能不令人为黔中佛学悲。

逃禅出家，乃明末清初士大夫之风气，滇黔为南明最后领地，明士大夫多集于此，故黔地士大夫多有逃禅出家者，由此形成黔中特有的禅宗佛教文化景观。他们或倾心佛门，喜嗜禅悦，如蒋杰、谢士章、丘禾实、艾友兰、文安之、曹申吉、查慎行、

曹维成等是；或啸歌山林，逃禅遁隐，如李合麟、刘个臣、吴中蕃、刘文季、胡钦华、邹宗孟、吕大器、高雪君、李专等是；或索性削发出家，以示爱国之情操、不仕之决心，如钱邦芑、郑於斯、陈起相、郑逢元、黎怀智、朱文、程源、皮熊等是。他们的大量表明心志的诗文著述，如钱邦芑（大错）的《大错和尚遗集》、陈起相（掌山）的《掌山法语》等，不仅具有极其深邃的禅学思想，而且也体现了他们感鬼神而泣风雨的浩然正气。故其禅学思想与人格精神，不独提升了贵州佛教的文化品格，有功于黔中佛学，而且亦有助于后人激发爱国之热情。

三、黔中易学：本土化经学的言说方式

黔中易学多集中于明清时期。明清时期是贵州文化史上空前繁荣的一个时代，这个时期，全省各地涌现了一大批研究《周易》的学者。据贵州地方史志记载，明清两代黔中易学著作达 43 部之多。明代正统、景泰年间易贵的《易经直指》，首开明代黔人研易之风，其后李渭的《易问》、阴旭的《读易应蒙》、孙应鳌的《淮海易谈》问世，迎来明代黔中易学的勃兴。入清代，安平（今平坝）陈法的《易笺》，麻哈（今麻江）艾茂的《易经人道集义》，铜仁戴世翰的《易艺》，黎平胡秦川的《学易确然录》，贵阳王璋的《易经集说》、傅昶的《古易殊文记》、《易源》、孙谦的《易理三种》、丁泽安的《自得斋易学》《学易节解》《易学三编》《易学附图》《易学汇说》，清镇文天骏的《周易或问》，遵义肖光远的《周易属辞》《易字便蒙》《周易属辞通例》《周易属辞通说》等易学大师的著作，构成黔中研易的狂飙运动，标志着黔中易学系统的形成，从而有了与中原易学学术思想对话的基础。黔中易学，作为一种本土化经学的话语言说方式，表现出与中原易学界主流思想不尽相同的风格。其中，最著名和最哲学意蕴的当数孙应鳌的《淮海易谈》。《淮海易谈》4 卷，近十万言。是孙应鳌系统地专门研究阐发《周易》的哲学专著，集中代表了其易学观，是贵州建省以来最有影响的易学著作。

孙应鳌易学主要有四个特点：第一个特点是其属于义理易学中的心学派。义理易学是易学研究中的主要流派之一，主要阐明《周易》的哲学大义，与象数派、训诂考据派相对。义理派既反对象数派的繁琐，又否定训诂考据派的训诂，而精于明理，注重探求宇宙和人生的哲理，其代表人物有魏晋时的王弼，北宋的胡瑗、周敦颐、二程，南宋的朱熹。孙应鳌易学对卦爻辞的解说亦主张取义，属于程朱的易学系统，是义理派易学。然而，孙应鳌易学主要以人心，即人们的精神和道德意识来解释易理（宇宙的原理），属于义理易学中的心学派，这与程朱理学派强调天理为事物之所以然的易学哲学又有所不同。这样，孙应鳌一方面继承了魏晋唐宋易学中的义理学派的传统，一方面又扬弃了程朱的理学观点，以心学的明心体观念为中心，解释《周易》经传；孙应鳌易学的第二个特点是，其解《易》往往是“以经证心，以心证悟”，不拘于传统的训律，不死扣书本，常常是随己发挥，从心学的角度去解释《周易》的内容，强调“《易》之不可为典要，在用《易》者于己取之而已”；孙应鳌易学的第三个特点是，其治易学的方法是沿着中国传统的思维模式，论证天人合一、万物一体。孙应鳌的天人合一、万物一体的易学方法主要有两方面的意义。一方面是心便是天，天非外在：“道之大原出于天，天外无道，其实体备于人，人外无道。……天人无二理，知天知人非二事。……是天人合一本诸身而征诸庶民者，一以贯之矣。”显然，这是王阳明天人一本说的发挥。另一方面，是把“以天地万物为一体”作为先在的本体和最高的精神境界。在孙应鳌看来，就心的本来面目而言，每个人与圣人一样，都是以天地万物为一体的，因为在本体论上，人与万物本来就处于元气流通的一体联系之中：“天地之所以为天地，浑然唯此元气也。……元气之成象为日月，元气之运行为四时，元气之变化为鬼神，元气之虚灵之在人者为心，一也。”这种元气流通、心气合一不仅具有物质实体的意义，也同时包含着把宇宙成一个有机系统的意义，无论哪一方面，都是强调万物与人心的息息相关的不可分割性。以天地物为一体既是本体，又是境界。孙应鳌认为，万物一体的境界就是把万物看成息息相通的一个整体，这个整体就是大我之境，把宇宙每一部分都看作与自己有直接联系，甚至就是自己的一部分，这样的境界就是仁。他说：“仁言体，盖天地万物之备于我者，无少缺欠，无少渗漏，其浑然无所不包，我之此身真与天地万物合体矣。”孙应鳌易学的第四个特点是，直接肯定宇宙本体与伦理道德原则的同一性，属于伦理型的易学哲学，带有中国哲学的固有色彩。晚清贵州遵义的著名学者黎庶昌在《刻〈督学文集〉序》中说孙应鳌之学“以求仁为宗，诚意慎独为要，以尽人合天为求仁之始终，其于成己成物、位育参赞、天人一体之原，心契微妙，温故知新，浩然自得”。从孙应鳌易学的这种特点来看，这一评论无疑是中肯而全面的。

由此可见，孙应鳌不仅是晚明心学派易学的代表，同时也是贵州明清时期义理易学心学派的先驱，其心学解易模式对贵州

清代易学家直接或间接地产生了一定影响，开启了贵州易学经世致用的早期启蒙思想。

四、文化发展：从多彩贵州到文化贵州再到思想贵州

由上所述当可见“黔中三宝”源远流长，积健为雄，受到了全国学术界的普遍尊重和认同，代表了贵州传统文化的人文智慧，为贵州的民族文化和学术思想作出了巨大贡献。然而曾经的辉煌正在渐行渐远，今之贵州似乎除了多彩贵州就乏善可陈，一种文化开不出美丽的花朵，是因为它远离了形而上的智慧。在建省 600 年的今天如何发展和繁荣贵州文化、打造贵州文化和宣传贵州文化，我们往往迷失了方向，未能很好地找到本土传统文化中真能滋生现代化意识的活水源头，未能科学地分析贵州传统文化的历史发展和现实影响并考察其创造转化的可能和途径，未能发现本土传统的形上智慧与现代社会的人生意义和存在价值的结合点和嫁接点，从而未能形成自己独特的学术文化知识体系这个软实力。这就不仅掩埋了“黔中三宝”的思想光芒，使之被人遗忘，濒于夭折；而且无法解释自己的本土文化，无法建立我们的文化自觉乃至文化自信，从而严重地延缓了贵州文化走向全国、走向世界的发展进程。作为当代贵州人，我们总是生活和思考在贵州的传统文化之中的，传统文化并不是已经死去的历史陈迹，而是至今活着的文化生命。今天我们要打造从多彩贵州到文化贵州再到思想贵州，“黔中三宝”作为贵州本土的形上智慧资源，将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进一步开发“黔中三宝”，这对于贵州从历史与现实的结合上加强地域文化的建设，对于人们更好地认识贵州在我国文化源远流长的发展进程中的贡献和重新评估整个贵州学术文化在全国的地位，对于最大化地利用区域文化资源以作现代性的创造转化，使贵州人在了解自身文化传统的基础上回应时代的挑战，对于振奋贵州人文精神，弘扬传统文化，都将产生深远的影响和积极的作用。